

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 口述史研究的效度及其分析框架

周海燕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口述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个体经验是否具有信度的争议。既有研究往往通过抽样, 随机性地获取口述对象, 从而保证所获取的材料具有可代表性; 或是将口述史资料与档案资料进行比对来保证其有效性。但这些方法都未意识到口述史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口述史研究的效度不仅体现在个体的经验能够证实历史事实, 更在于它能够反映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所说的“社会事实”。因此, 研究者应该在口述对象的选择、口述资料的搜集、访谈过程的深入互动以及对资料的解读和分析等环节中充分把握好: 1. 位置与关系之间; 2. 内容和语境之间; 3. 感知、行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 追溯个体如何联结而构成社会的过程, 从而让个体经验进入“大写的历史”。上述三组张力, 构成了口述史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关键词] 口述史; 个体经验; 行动者网络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21) 06-0119-09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21.06.012

近年来, 关于口述史的研究在国内呈现越来越蓬勃的景象。中国知网(www.cnki.net)的检索结果显示, 第一篇口述史专题论文发表于1998年, 此后, 相关主题的论文数量迅速增长: 2013年到2019年, 口述史领域6年来年平均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简称CSSCI)上论文发表量接近54篇。至2020年1月1日止, CSSCI上关于口述史相关论文共计593篇。口述史的专著出版也明显增加。除此以外, 关于口述史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也陆续出版^{[1], [2], [3]}。文学领域和新闻学领域的口述史作品的出版等更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诸多研究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在国内学术界的巨大活力。

但是, 口述史所引发的争议也不少见。其中最具有争议的是信度与效度问题。在量化研究中, 信度指的是测量方法的质量, 即对同一现象进行重复观察是否可以得到相同的资料。而效度则是指实证测量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概念的真实含义^[4]。在定性研究中, 尽管研究者并不使用可重复和可测量的方式来进行考察, 但其研究内容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同样是评估研究价值的关键所在。不过, 定性研究的“信度”, 体现为内容的准确和可靠, 就口述史研究而言, 指的是“如何判断访谈者的记忆是准确可靠的?”而“效度”体现为如何判断“此访谈是契合相关研究主题的描述^[5]?”换言之, 即研究是否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能够有效促进我们对所讨

[收稿日期] 2021-09-05

[作者简介] 周海燕(1972—), 女, 江苏盐城人, 博士,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口述史、当代中国研究等。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民族认同感的两岸媒体抗日集体记忆话语研究”(项目编号: 16BXW007)的阶段性成果。

论主题的理解和阐释。

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借鉴定量研究的方法来解决效度问题，例如，有学者试图通过抽样，随机性地获取口述对象，从而保证所获取的材料具有可代表性^{[6]、[7]}。美国口述史协会主席爱丽丝·霍夫曼（Alice M. Hoffman）则认为，记忆的效度是指被访者叙述与其他主要来源材料（如文件、日记、信件或其他口头报告）报告的事件本身的一致程度^[5]。换言之，她认为，确定记忆研究有效性的仍然是可用以质证的书面史料，其中，档案史料尤其被置于价值序列中的优先地位。

对个体口述叙事与书面材料“一致性”的要求本身就隐含着将档案资料视为具有更高史料价值的预设，同时，它也预先设定了“大写历史”中的价值点，因此，个体材料在其中往往只被用于作为主流叙事的片段证据，在其使用中，研究者多倾向于选择那些适合既有价值点的材料。这导致一些学者批评说，口述史除了提供一点生动鲜活的轶事趣闻，对专业历史学者的贡献非常微弱^[8]。但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档案史家还是口述史家都发现，当事人回忆的细节往往并不准确。实际上，有研究证实，某些特定细节的追忆恰恰是口述史的短板^①。由此这也就带来了针对口述史价值更为强烈的质疑。

必须指出，前述这一预设本身就值得探讨和反思——来自档案史学的批评或许其来有自，但并没有触及口述史价值的核心。而针对上述批评所采取的解决措施，如抽样、交叉质证等，更未意识到口述史研究的独特价值所在。口述史的效度不仅体现在个体的经验能够证实历史事实，更在于它能够反映涂尔干所说的“社会事实”^[9]。在口述史中，“社会事实”包括了人们对某一特定事件、某一历史时期的认知、情感和付诸行动背后的判断与抉择，更帮助研究者理解人们的主体性是如何在社会中、在其经历的变化和遭遇中形成与改变。在社会建构的路径下，口述史强调“在访谈过程中探求被言说的历史特定图景，刻画其结构，推断这种图景和结构的因果关系，以及它如何帮助理解被访谈者，理解他们对那段历史的看法。”^[10]记忆与集体相连，既是集体的，

多元的，又是个体的^[11]。换言之，口述史比之传统的实证史学更擅长探索的，不是被记录的档案事实，而是当事人在特定社会框架中看到、认知、感受、体验到的经验事实，以及他们如何根据这些事实做出判断并付诸行动。口述记忆的价值恰恰在于亲历者置身于社会中的个体经验、情感和价值判断。因此，研究者一方面应该关注它与既有档案史料之间的一致性，即实证史学所看重的“证实”；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但需要强调的是，关注这种差异不是关注实证史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路径即通过辨析差异来“证伪”，而是关注在口述材料和档案史料所形成的张力中如何更好地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口述材料所反映的、与档案史料迥然有别的图景能够反映出人们对所经历事件的感受、理解与判断——尽管它完全可能与档案史料的记录背道而驰——这也最终影响了他们在这段经历中所做出的选择。

进一步需要探讨的问题是，每一个体在大事件中都处于特定的位置，只能看到历史的一个侧面，相比起重视记录关键人物、关键节点、事件全貌与因果、相关数据等资料的档案史料，个体口述叙事难以给出后人期望的“全面、客观和准确”的材料及评价，那么，由于个体经历、视野的局限，其个人生活历史在历史书写中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它如何进入大历史的书写？

要解决这个问题，口述史的资料搜集和使用既不应该只服从于主题的叙述，成为档案资料的补充；也不能只强调个体经验的独特性，而使得历史的书写无限碎片化。研究者应该在口述对象的选择、口述资料的搜集、访谈过程的深入互动以及对资料的解读和分析等环节中充分把握好：1. 位置与关系之间；2. 内容和语境之间；3. 感知、行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追溯个体如何联结而构成社会的过程^{[12]1-7}，从而让个体经验进入“大写的历史”。上述三组张力，构成了口述史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一、位置与关系

口述历史是一个处于变化和流动中的“阐

^① 霍夫曼自己对于她丈夫在二战中的记忆的长时间观察和实验，以及其他实验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参见 HOFFMAN M A, HOFFMAN H 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oral history: the case for memory [M] //JEFFEREY J, EDWALL G. Memory and history: essays on recalling and interpreting of experienc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 107-130.

释性的过程与产物”^[6]，当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和关系发生变动时，我们感知、描述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记录口述对象对历史事件的回忆时，访问者往往十分重视被访者所看见的历史场景和其中的细节——这是对的，因为档案史料往往着力于“大历史”的宏观描写而忽略了历史的质感和细节，在场者的回忆可以为大历史提供十分珍贵的补充。不过，这种补充绝不只限于上述内容，否则，就会像很多实证史学学者所诟病的，口述史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不过是为大历史提供了少量生动鲜活的细节而已。如果说亲历者更擅长的是在回忆中描述一个个特定的历史图景，那么，研究者则不仅要尽量准确地还原这些图景，还需要通过关系和位置视角的考察，了解当事人在“看见”这幅历史图景时所处的社会位置，这幅图景的呈现者是谁，所看到的景象与什么更大的图景相关联，以及这些关联背后的意义。这就是说，研究者要在口述史访谈中注意了解被访者和其他相关人的位置、层次、位差和互动关系，以及这些互动中反映出的群体结构；要深入到表面化的场景之下去探求其深藏的社会机制，并推断这种场景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例如，在三线建设中，建设者们描述得最多的，是他们刚到贵州时看到当地的落后状况和经过建设后当地被改变的面貌。作为一种“见证”(Witness)，这些史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研究者应该对被访者对当地社会的这种“看见”——亦即观察和思考行为背后所隐含的视角、身份和位置——保持敏感性。举例来说，工厂早期的筹备组干部在对当地地貌与交通的落后状况娓娓道来，其叙述往往与工厂选址、工人驻地的保密考量密切相关。此时，研究者不应该只将上述地理交通的状况叙述视为对“落后”的一般性描述，而应该意识到，选址问题与地理形貌对于“备战”的主题至为关键，而它所呈现的社会图景，更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备战”气氛浓郁这一更宏大的历史背景紧密相连^①。那么，备战的路线图来自哪些机构工作人员的描绘、传达？这些人又如何对这些建设者讲

述三线建设的意义并进行政治动员？其间，图景的呈现过程中，哪些象征和符号被怎样使用？媒介在图景的呈现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由此可见，从位置视角入手，研究者应该格外注意询问口述对象的身份、阶层和在所处阶层中的地位，理解不同当事人对事件观察和体验角度所带来的差异，将这些与其所见相互联系进行考察，以获得更为深入的解读——个体的身份、地位及其关系网络，往往决定了他能够看见并给予关注的内容，更决定了他解读这些经历的解释框架。

对于口述者所提及的相关人物，我们同样要关注他们在群体/组织中的角色、群体/组织内与群体/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尽可能完整地描绘出群体/组织的层级和相互关联。在一个事件中，参与者是处于底层角色，是决策者、中间层还是游离于边缘，甚至怀有抵制心态，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对这一事件的认知和判断，也会影响他所采取的行动。例如，在三线建设的人口迁移中，普通民众可能更多受到相关政策所带来的实际利益的引导^②，中层干部更多感受到的则是政治动员与社会控制的双重压力，而他们的家属则更为关注前往三线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③。因此，在分析上述材料时，我们就可以从亲历者当时所处的位置来理解社会群体/组织的机构组成、层级关系、内部规则和运作方式等以及它对个体的不同影响。

需要厘清的是，笔者这里所指的“群体”和“组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通过相互联结而最终形成的变动不居的“社会”(Social)^{[12]5}。在口述过程中，口述者的叙事和其他叙事一样深植于文化和历史传统^{[13]10}，但这些传统不是预先加诸于我们的，借用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中所指出的，没有人在与他人发生联结之前就生活在“文化”中，分享“范式”，或属于“社会”^[14]，因此，被采访者的口述也需要被置于更广阔的社会互动网络中去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进行解读，如此，

① 贵州安顺三线项目 LSF 访谈，2019 年 7 月 21 日，访谈人：陆远、王余意。

② 贵州贵阳三线项目 HQL、ZYL 访谈，2019 年 7 月 7 日，访谈人：周海燕、张航瑞；贵州贵阳三线项目 ZLM、LGY 访谈，2019 年 7 月 19 日，访谈人：曹慧中、肖鸿禹。

③ 贵州贵阳三线项目 MXZ、LXY 访谈，2019 年 7 月 21 日，访谈人：周海燕、张航瑞。

采访者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口述者因所处社会位置和关系网络中而被建构的认知框架,也能够理解他或与主流叙事一致、或与之相反的观点、评价与行动决策。

对于社会位置历时性变迁的关注也应该是口述史研究的一个要点。口述必然是基于当下经历对过去的经验事实进行筛选、过滤和重组后重构而成的相对完整的叙事,它深刻地受到当下认知框架的影响,往往被视为“后见之明”。但应该注意到的是,所有“自我”都是由社会过程建构而成的^[15],因此,对“自我”的叙述恰恰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映照。个体经历在历史变迁中,其认知框架随着其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采访者要格外关注在历时性过程中个体经历与这些认知框架之间的互动,即“受访者洞察自我内在过程的能力”^[16]。例如,一位知青在刚刚“上山下乡”的初期、后期,到回到城市的早期,以及他在当下的身份和所处社会阶层,都会使他对过去这段经历的回顾与评价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口述者在接受访问时的回忆则不可能回避当下的社会语境与个人境遇。因此,基于历时性角度对其现在的叙事进行提问,关注他当时的想法、其间有无发生的明显转变,直到今天如何评价和思考一生的经历,更准确细致地了解口述者在不同时期对这段经历的思考以及背后的事件契机非常重要,我们常常在口述现场听到亲历者说:因为这个事,我对……的看法就完全变了/我变了一个人……等等,这就是当事人由于个体经历而对事物评价发生转变的事件契机,研究者应该对此一社会过程保持高度关注,进行基于历时性的比较,才能够更深入地考察个体经历与处于变迁过程中的认知框架之间的互动。

从关系入手,访问者要注意理解同一事件中亲历者在结构中彼此的互动关系。这是因为,他们的相互关系与其互动和行动密切关联。例如,一些三线建设的口述者谈及,在从东北迁移到贵州的过程中,由于工厂内部是整个车间整体搬迁,如果自己选择拒绝迁移,则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因此,即使内心并不情愿,也必须前往。由此可见,群体内的联结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

将对个体的行动产生明显的影响。再如,同样是已经退休的三线干部,如果其子女仍留在企业内,那么,他们对三线企业当下运作状况的评价就会比没有子女在工厂内就业的人要谨慎得多^①。从这些可以看出,研究者口述时面对的虽然只是个体,但不能把访问只看成是个体故事的孤立挖掘和呈现,而要注重询问与被访者其他相关人士对同一主题的看法以及他们当时的互动、决策与讨论。举例而言,一个女性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回忆,不仅仅与其个体认知和参与程度相关,因此,我们不能只关注她的个人看法以及如何参与运动的过程,还需要询问她最初的家庭状况和身份、阶层、地位,以及当时她对女性地位的认知,是谁、在什么情况下鼓励她参与这项运动的,对方如何向其进行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蒙,她最初参与其中时担任了什么角色,她和哪些人共事,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如何相互激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参与者们的各自态度如何?她们是如何克服困难的?这些工作是否在某个程度上改变了周围环境对女性的态度?其家庭成员的态度如何?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事先做一些准备,利用历史图片、名录列表等对口述对象进行启发,鼓励他们说出其他参加者的情况,这些都助于激发口述者的回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要尽可能争取采访处于同一社会网络中的其他关联者,甚至使用焦点小组的方式,对如家庭成员、上下级,或是某一个行动的共同参与者进行口述访问^②,如此,我们就能够比较深入地考察共识或分歧是如何形成,成员的行动是一致还是分散,是否南辕北辙等等。

焦点小组访问、交叉访问或是至少询问当事人其他参与者的情况,会有助于访问者不仅仅接受被访者的孤证,而更多地将其说辞置于一个动态网络中去考察。简而言之,研究者要关注网络中行动者的互动与相关行动——被访者相关情况的回答往往能呈现出群体对同一主题的看法的相同点或是差异点,以及他们当时的互动、决策与讨论。

二、内容与语境

口述史的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样貌。“横

① 贵州水城三线项目 HZZ 访谈,2019 年 7 月 24 日,访谈人:周海燕,张航瑞。

② 云南昆明知青焦点小组 ZY 等访谈,2019 年 12 月 10 日,访谈人:周晓虹等。

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对历史事件的解读都带着其个体经历和主观色彩。这在三线建设的口述叙事所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面貌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一位住在医院干部病房的老人，回忆起三线建设时非常自豪，也高度肯定了三线建设的意义^①；但和这位老人同在一个单位却因伤致残的底层工人，在回忆时则始终在诉说参加三线建设后给家庭带来的苦难^②；一位三线铁路医院的医生，一方面清楚地回忆了自己由于家庭成分问题而不得留守在偏远地区的愤怒、无奈和痛苦，但在讲述铁路医院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为当地民众治病并带来现代社会的卫生知识、文化知识时，仍然表露出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③。上述迥然有别的个体境遇使得有关同一历史事件或群体的叙事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的样貌。其间，既有断裂与延续，也有凸显与遮蔽还有收编与抵抗乃至颠覆。在使用这些材料时，部分研究者会选择与自己定下的主题叙事相契合的内容，另一些则有意识地保留其原始形态。笔者倾向于尽可能保留原始形态的方式，以更好地将口述的内容与其社会和历史语境结合起来分析，更深入地理解和处理所获得的口述材料。

在使用“语境”这一术语时，社会学家指的是解释事件的社会力量；对于历史学家而言，语境则是一系列与时间框架紧密相连的事件^[17]。无论如何，这两者都同意，口述者讲述的内容与语境紧密相连，我们不能孤立地只研究内容——“这个人诉说了什么样的经历”，而是要深入考察其讲述内容与语境之间的关系。

叙事模式与社会语境是分析内容与语境时首先需要注意到的一对分析框架——口述者的叙事并不仅仅是个体经验，它也极大地受到社会框架的影响^[18]。叙事模式与个体当下所属群体、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认知框架密切相关。老干部之所以对三线建设主要持肯定态度，与其所处相对优越的社会位置及拥有的相关待遇（收入、医疗待遇、政治地位）等密切相关；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煤矿伤残工人，在看待三线建设的意义时，其评价势必受到自身经历和群体文化的影响，其对不公正待遇的批判常常来自当下希望获

得承认乃至经济补偿的现实需求。此外，他们的回忆也会受到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因此，研究者应该有意识地关注群体中的个体经历与其讲述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看到文化传统、历史经历和权力如何塑造了当事人解释事件的视角。

叙事中暗含的类型及其命名在分析内容与语境时同样值得关注。例如，我们曾经在三线建设者的口述中听到这样的说法——“一般人你进不来。比如你祖父那时候是富农，那就不行。我家是贫农成分，那时候贫农是出身特别好的家庭，也算是根红苗正，‘越穷越光荣’，有那个说法^④”。在这样的叙事中，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经历，还包括其中展现出的类型及其命名——如“先进/后进”“富农/贫农”、政治成分这样的类型是如何被确定的？其标准如何？其他还有什么类似的政治类型？这些类型的标准由谁制定、如何制定，其规则又是如何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在被归类之后，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如果能够就以上的内容与口述者进行进一步的交谈，那么，上述内容就能够清晰地展现出制度是如何付诸社会实践的过程。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序列问题。就目前笔者的研究心得而言，价值序列对于理解“大写的历史”如何影响个体格外有价值。例如，研究者常常在女性生活史的叙事中听到这样的表述：“我爸我妈觉得女孩不需要读书，能干活就不错了。家里还有弟弟，负担重，所以我很早就进了工厂”。可以看到的是，上述司空见惯的叙事中呈现出的是父母对性别价值序列的观念及其行动。再如，不同层级的劳动模范，是如何从低到高一步一步地评出来？这些序列背后的标准是什么？而这些标准又如何从上到下，一步步贯彻到基层？档案文件的相关规定可以呈现出上述价值序列的认定标准和规则行文，但口述者的讲述，则可以生动和具体地展现出规则被运用的过程，这有助于研究者观察规则如何被付诸社会实践并对个体产生影响。

另一种序列则是时间序列。例如，讲述者普

① 云南昆明知青焦点小组 ZY 等访谈，2019 年 12 月 10 日，访谈人：周晓虹等。

② 贵州贵阳三线项目 LSQ 访谈，2019 年 7 月 21 日，访谈人：周海燕，张航瑞。

③ 贵州贵阳三线项目 MZH、WZX 访谈，2019 年 7 月 21 日，访谈人：周海燕，张航瑞。

④ 贵州安顺三线项目 LSF 访谈，2019 年 7 月 21 日，访谈人：陆远、王余意。

遍提及，“三线建设的时候政治审查是很严格的，要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政审”，那么，她/他经历的政审过程是什么样的？通过口述者对自己政审经历的讲述，研究者得以观察到制度运作的流程。当然，如果能够有意识地请口述者回忆不同时期的政审经历，研究者还可以观察到制度“松”与“紧”的变化。这些，都能够突破就事论事的、对内容本身的分析，而有机会观察到个体行动背后的社会力量。

有的时候，口述内容与历史语境之间高度契合，“大历史”在个体的讲述中得到了证实和丰富；有的时候，口述者的讲述与主流历史叙事的契合则事出有因。周晓虹在分析知青叙事中“青春无悔”主题的凸显时就指出，这一类记忆的流行，与大部分知青在数十年的光阴之后，渴望摆脱社会边缘化地位，而主动靠近主流话语，在心理上靠近权力群体有着密切关系^①。因此，在考察这类叙事时要特别注意时间序列上内容变迁的考察。

另一些时候，口述内容与历史语境之间则会发生明显的断裂。刘亚秋在对知青的研究中就曾经观察到，一位知青在口述中对经历的下乡之苦描绘极为生动、具体和详尽，但却只字不提“文革”这一导致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被迫经历“上山下乡”，命运发生巨大改变的重大历史事件^[19]。如果研究者仅仅孤立地分析其口述文本而忽略叙事中刻意被隐藏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们对亲历者心态的影响，则势必陷入盲人摸象、各执一词的困境。

三、认知、情感、行动与结构

个体认知、情感、行动与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难点。尽管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很早就指出，“是自身内部的冲动与利益，把个体推向他人的世界……导致了所有社会关系的形式的产生，也正是这些关系使彼此分离的个体组成了社会^[20]。”但后来的大部分社会学研究仍集中于理解社会是如何限制乃至操纵个体行动的。例如，关于认同的研究就专注于理解社会结构对个体行动的影响^[21]。符号互动论则认为，所有自我都是由社会过程建构而

成的，因此，自我反映出的是社会关系^[15]。相对而言，较少有研究反过来考察不同个体基于自身的主体性对这些社会结构给予的限制的反应，以及个体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付诸行动。例如，当考察某个民族象征对人们的影响时，研究者往往预设社会中的个体，无论其所属群体如何、个人经历如何、个体特质如何，都会产生类似的情感和反应。由此看来，口述史最为独一无二的价值，在于能够从当事人的口中理解个体对某个问题的认知、情感和判断如何影响到他最终的判断和行动。由此，我们得以探究个体对社会的感知，也由此去观察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因此，口述史的研究者在与被访者的对话中，要格外注意观察上述诸多环节，以考察个体认知、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充分地挖掘口述史研究这一独特价值。

（一）如何观察个体认知、情感与社会结构

如前所述，个体讲述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语境紧密关联的，这意味着，个体的认知也由社会框架所塑造。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实验心理学学者巴特莱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就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到了这一点。巴特莱特把这种社会框架称为“图式”，认为“图式”决定了个体如何记忆^{[22] 262-280}。他也指出，情感性的态度会明显地影响回忆^{[22] 271}。此外，一些学者也指出，认知和情感不可分离^[23]。因此，在口述史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借鉴“情感”政治的分析框架。例如，袁光锋指出，怨恨、戏谑、愤怒等情感的产生往往与公众的平等和正义观念有关，公众的平等观、正义观是这些情感产生的认知背景^[24]。因此，在口述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格外注意个体认知及其情感体验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关注在历史事件中人们的认知是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又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情感表达。例如，在苏联援建156个工业建设项目的口述回忆中，从上海、长春等地前往洛阳支援建设的人们会描绘欢送会的盛况，但很少提及自己在现场的感受和表达出的消极情绪。但他们的家庭成员如配偶等，则会回忆起在离别时整个家庭感受到的不安。由此可以看出，欢送

^① 参见周晓虹在《社会记忆与群体心理的形成与维系：以“知青”和“七七级人”为例》中对知青“我群”和“他群”的形成所作的分析，发表于“社会生活研究工作坊”，太湖群学书院，2016年7月9日-11日。

现场令人兴奋的公共情感表达实际上受到了群体压力的极大制约——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即使内心存在消极情绪，当事人也难以公开表达。个体公开表达出的激越情感，一方面受到群体表达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会被其他个体所看见、感知，这形成情感表达的群体压力^①。与此类似，当时人们的生活较之今天要差很多，但可以感受到，今天人们回忆起过去，对当时经历的抱怨更加强烈，这与当下的社会建构是不无关系的^②。研究者在记录受访者对历史场景的描述的同时，要格外注意了解在这一历史场景中人们情感表达的特定社会规则，将被访者的情感表述区分为情感感知和情感表达两个层次，从而更好地考察社会动员、社会控制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体的影响。

在剖析原始人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时，涂尔干就指出，“全部仪典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唤起特定的集体情感和观念，将现在融入过去，将个体融入集体，聚集的人群置身其中的心理状态，事实上构成了所谓仪式心态的唯一坚固和稳定的基础^{[25]382}。”从这里可以看到，个体融入集体的过程并不仅仅与加入组织、获得接纳有关，还与情感融合与观念认同密不可分。

（二）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

安·斯维德勒（Ann Swidler）曾经在“文化工具箱”理论里提出，在考察文化如何影响人的行动时，是否真正相信某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并非问题核心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在某个情境下选择某种文化作为工具为自己的行动赋予合理性，即将文化作为工具进行“策略性的选择”。这一路径将研究者们争论不休的、难以判断真实性的个体信念转换为可观察的、社会语境下的个体行动^[26]。无独有偶，拉图尔也指出，要考察人们的认知与行动的关系，其关注的核心不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某一信念，而是如何付诸行动^③。沿着行动的路径，口述史可以从人们的叙事中深入探究其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例如，在关于“为什么要放弃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去建设三线”这一问题上，很多人的回忆里都提及，因为当时宣传说担心苏联入侵，

毛主席睡不着觉，为了让他老人家睡好觉，我们就要去三线搞国防工业建设^④。可以看到，这一叙事中包含了人们对国家形势基于宣传框架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激发出的、朴素的爱国爱党的情感——看似不合理的个体选择中折射出社会对于情感的管理过程^[27]，实际上是社会框架所塑造的认知和情感的结果。从口述中，研究者能够观察到人们的认知、情感、此后付诸的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这为分析个体经验与大写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思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个体行动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结构对个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但并不能完全主宰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动。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原有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结构会轰然崩塌，新的结构产生并取代原有的结构，例如，正是安徽、四川等地农民们悄然进行的承包地实验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并最终导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原有的人民公社制度。由此看来，个体既受到结构的制约，但人们的联结和共同行动同样可以对结构进行再生产。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这种个体经验的汇聚具有改变社会结构的可能性。无论是女性通过讲述自己被性骚扰的经验来建设性别平等社会的“Me Too”运动，还是民众抗议资本剥削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及黑人通过讲述自己的种族歧视经验来抗争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运动等都显示出，通过在互联网等媒介中讲述和分享自己的个体经验、感受和认知，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迅速形成连接。这种“连接性行动”与传统的、以实体组织为核心的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不同，它基于数字化网络和社交媒体，将个体有效地组织起来^[28]。很容易注意到，经由这种“连接性行动”，海量行动者得以在短时间内相互连接，实现从地方到全国乃至跨越国界的动员。它更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所设置的公共议程不再由精英把控，并能够有效地吸纳公众的个体经验和感

① 苏联援建项目洛阳 WJK、TMJ、WZY 访谈，2019 年 1 月 11 日，访谈人：周海燕、彭圣钦。

② 关于情感的社会建构，请参见成伯清. 怨恨与承认——一种社会学的探索 [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5）：59-65.

③ 关于“believe VS behave”，拉图尔有非常具启发性的讨论，请参见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0.

④ 贵州贵阳三线项目 FYD 访谈，2019 年 7 月 17 日，访谈人：吴晓萍、蒋萌；贵州安顺三线项目 LSF 访谈，2019 年 7 月 21 日，访谈人：陆远、王余意。其他很多访谈也不同程度地提及这一说法。

受,通过公众自发的个体经验分享,激发彼此情感共鸣,逐渐达到观念上的认同,并随着网络的壮大和认同的巩固,个体一开始并未清晰成形的想法可能迅速转化成为线上和线下同时进行的集体行动。由此,互联网上的社会动员形塑了全新的传播政治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如何看待个体经验与大写历史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拉图尔基于行动与关系的视角,在其“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中提出的“转译”(Translation)的概念值得重视。拉图尔指出,具有主体性的个体行动者会在行动中不断转译意义,逐渐相互连接,形成利益/兴趣(Interests)的同盟关系(Allies)。他也特别强调转译是共存而非传递因果的关系,因此,关系各方的主体性应该受到重视^[12]¹⁰⁸。从行动者网络的理论旨趣可以看到,行动者连接的方式不是对既有表征的“编码—解码”,而是不断转译其意义并付诸行动,社会结构并非先在的条件,研究者应该重点考察行动的紧密相连如何形成“整体”,也就是如何在关系中不断重组社会的过程^[29]。在ANT视角下,如BLM运动等连接性行动过程清晰地显示出个体叙事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某个个体的经验能够有效唤起其他个体的记忆、情感,从而使他们形成经历、情感和认

同上的连接,集体行动由此和个体经验紧密关联。

从这一路径进入,研究者得以打破个体和集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个体经验不再仅仅是社会框架拼图的一部分,正是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们不断转译的个体经验聚合与汇流,形塑了大写的历史。通过对自己的经历的讲述,“敢于自己叙述”使得“社会行动者重获其叙述能力”^[30],个体的叙述最终导向了共同行动。

四、结论

行文至此,回到研究者最初提出的问题:作为个体经验的口述史该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简而言之,研究者需要关注个体经验在社会中的关系与位置,需要关注个体叙事的内容与语境之间的契合或是断裂,更需要关注个体认知、情感和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个体经验是大写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可能在某些时刻形成对立叙事,甚至可能颠覆大写的历史。因此,它们之间不是部分臣服于整体的关系,不是静止的碎片组合为完整的拼图,而是不断联结的个体经验形塑了整体历史,大写的历史是无数个体行动与叙事连接在一起的结果:它们彼此都始终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 [1] 游鉴明. 她们的声音[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
- [2] 李向平,魏扬波. 口述史研究方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3] 定宜庄,汪润. 口述史读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4] BABBIE 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M]. 7th ed. Belmont: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124-127.
- [5] HOFFMAN M A, HOFFMAN H 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oral history: the case for memory[M]//JEFFEREY J, EDWALL G. Memory and history: essays on recalling and interpreting of experience.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107-135.
- [6] THOMSON A. 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in oral history[J].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2007, 34(1): 49-70.
- [7] HOBART J C, CANO S J, WARNER T T, et al. What sample sizes fo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ies in neurology? [J]. Journal of neurology, 2012, 259(12): 2681-2694.
- [8] GRELE R J. Oral history as evidence[M]//CHARLTON T L, MYERS L E, SHARPLESS R, et al. History of oral history, foundation and methodology. Lanham: Altamira Press, 2000: 35.
- [9] 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 狄玉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5.
- [10] GRELE R J, TERKEL S. Envelopes of sound: the art of oral history [M]. 2nd ed.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1: 213.
- [11] 孙江. 皮埃尔·诺拉及其《记忆之场》[M]//诺拉.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历史. 黄艳红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1.

- [12] LATOUR 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3] 格格. 社会构建的邀请 [M]. 许婧,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4]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01.
- [15] 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 [M]. 霍桂桓,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218.
- [16] GREEN A. Individual remembering and “collective memory”: theoretical presupposition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J]. Oral History, 2004, 32(2) : 35-44.
- [17] LATOUR B.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53.
- [18]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 郭金华,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45.
- [19] 刘亚秋. “青春无悔”: 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 [J]. 社会学研究, 2003(2) : 65-74.
- [20] 西美尔. 时尚的哲学 [M]. 费勇, 吴燕,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15.
- [21] 周晓虹. 理论的邂逅: 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路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31.
- [22] 巴特莱特. 记忆: 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 [M]. 黎炜,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 [23] BARNETT D, RATNER H H. The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97, 67(3) : 303-316.
- [24] 袁光锋. 公共舆论中的“情感”政治: 一个分析框架 [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2) : 105-111.
- [25] DURKHEIM 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382.
- [26] SWIDLER A.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6, 51(4) : 273-286.
- [27] 成伯清. 现代性的诊断 [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158.
- [28]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 : 739-768.
- [29] 拉图. 巴斯德的实验室: 细菌的战争与和平 [M]. 伍启鸿, 陈荣泰, 译. 中国台湾: 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16: 303.
- [30] 利科. 记忆, 历史, 遗忘 [M]. 李彦岑, 陈颖,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600.

From Individual Experience to “Formal History”: the Validity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

ZHOU Hai-ya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The reliability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has alway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in oral history research. Existing studies tended to randomly sample an oral object to ensure that the materials obtained are representative, or compare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o archives to ensure their effectiveness, but none of these methods are aware of the unique value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 The validity of oral history cannot only show that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 could verify the historical facts, but also reflect the “social facts” defined by Emile Durkheim. Therefore, in the selection of oral objects, the collection of oral materials, the in-depth interaction of the interview proces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data process, researchers should fully comprehe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d among position and relation, content and context, as well as perception, action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 of tracing how individuals connect to form society, so as to bring individual experience into recording “formal history”. These three aforesaid tensions constitute the basic analysis frame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

[Key words] oral history;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T (Actor Network Theory)

[责任编辑 梁利华]